

浮沈杂忆

陈学昭

浮 沉 杂 忆

《随笔》丛书之四

陈 学 昭

*

花 城 出 版 社 出 版

(大沙头 四马路)

广 东 省 新 华 书 店 发 行

广 东 新 华 印 刷 厂 印 刷

787×1092毫米32开本 5.375印张 110,000字

1981年3月第1版 1981年3月第1次印刷

书号 10261·12 定价 0.45元

0.17



一九七九年十一月于北京，
第四次全国文代会

I262/113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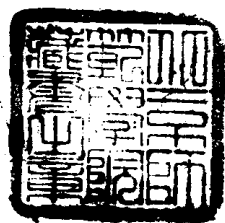
目 录

到基层去	1
写作、修改、再下基层	31
在一九五七年前后	55
再下去、再劳动、再体验	81
灾难的年月	99
展望和迎接未来	138

首都师范大学图书馆



20802295



802295

到基层去

从城站下车，已近夜晚九时了。我和小徐照着上海市委的叮嘱，就在城站对面的大众旅馆里租了两间小房间，小徐和别的男旅客同住一间，我总算租到一小间。放下简单的行李，立刻去旅馆附近的一家小饭店吃了点东西，回来准备休息。这里是我的故乡，可是我好象到了异乡，一切都很陌生。正是盛夏，天气炎热，不要说小徐不习惯这样的气候，就是我也不习惯。小徐和别的男旅客一样，熬不住小房间里的热，把铺板拿出来，搁在门外马路边，睡在露天。我呢，只好呆在小房间里，躺在铺上，觉得又闷又热，加上蚊子的骚扰，整夜没有睡好。天蒙蒙亮，我就起来了。小徐也没有睡好，当我开门出去，他早已呆坐在石阶上。我们到旅馆附近的一个豆浆摊上喝了点豆浆，吃了个烧饼，回到旅馆，付了旅馆钱，拿了行李，就雇了人力车往里西湖去。小徐不惯坐人力车，他无论如何不肯上车，宁愿跟着我坐的人力车——这是旧社会留下的交通工具——步行，其实我也不习惯坐，无奈有点行李，考虑到两人背了行李步行，有点累，而我自从

右肩负伤几次，连一斤重的东西也提不起。好在人力车拉得不快，小徐的步行完全跟得上。到省委时间还早，我们在传达室里坐了一会，照着传达室同志的指点，进去找到了谭震林同志的秘书。他邀我进一间屋子。小徐在外边。谭震林同志出来见我，邀我靠桌子边坐下，他坐在横端的一张椅子上。我把中央组织部的信从小布包里拿出来递给他，并转达了廖志高同志的话。谭政委看过信，问了我几句，就把我托给他的秘书。我把小徐的档案交给秘书，请求他转交给组织部。接着，这位秘书同志要我等一下，过了歇，他回来，给了我一封介绍信，告诉我去住招待所。

我和小徐照着秘书的信封上所写的地址，终于找到了竹竿巷附近的灯芯巷里的招待所。这是一座西式楼房，我和一位女同志同住一室。小徐和男同志住一起。同室的女同志姓赵，她是长征过来的老同志。招待所里住的同志很少。次日，得到招待所领导的同意，我和小徐去看了我的大寡嫂和由她带大的二哥的两个男孩，大的一个在杂货店做营业员，杂货店老板正要关门，他面临着失业的威胁，小的一个在一家小丝厂做工。第三个哥哥也已去世，留下三嫂和两男一女。只剩下了最小的哥哥，他离婚后又结了婚，生了两个男孩，两个女孩。他自己在太庙巷一个小学校担任校长，嫂嫂在另外一个小学校里教书。虽然是亲族，可是从一九三五年初回国见过一次，再也没有见过他们。在全国第一次文代会期间，我收到过二哥的次子由大会转交给我的一封信，我是照他那封信上写的地址找了去的。我把参加全国第一次妇代会

时期分到的布，剪成三段，给他们一家一段。

过了几天，得不到组织上的消息，看着有的同志走了。我心里开始着急起来，和小徐一起到省委组织部去要求下乡，组织上劝我先做点知识分子工作，说土改还在后面。但我还是坚决要求到农村去。接着，我参加了省里的一次会议，听了谭书记关于浙江形势的报告，向浙江全体党员布置了紧急任务：剿匪反霸。会议结束以后，我又去要求，终于同意分配我和小徐到一个农村工作团里去。我们到工作团报到后，就下到杭县义桥乡去了。

义桥乡面临运河，背靠群山，离杭州几十里地，交通有水陆两路。我和小徐是坐船去的。工作团驻在一家地主家，房东恶霸地主已被扣押起来，只留下一个老妈妈，其余的人都逃跑了。我和两个女同志住楼上一室，窗子临街。小徐和男同志们一起住，就在楼上我们房间过去一点的较大房间里。正是盛夏，天还没有暗足，蚊子就做阵了。我们点了一支蚊香圈睡觉，到后半夜蚊香圈烧完了，蚊子出来，在身上咬的象针刺一样。在下乡前两天，招待所里的一个女同志偶然谈到蚊帐，劝我买，我买到一顶小蚊帐，钱也不够买两顶，带到乡下，根本不顶用，太小，是圆顶，遮了头遮不了脚，就没有用它。离南方久了，我根本没有想到蚊子是这么多，这么厉害；至于小徐，连做梦也没有想到过南方的夏夜，竟是蚊子的天下。我和小徐想了一个办法，各人用一条被单把身子盖住，但是并不能解决问题，蚊子很聪明，它飞到面孔上、头颈边还是来咬。白天，我和小徐到村子里去串门，这里有

潜伏的土匪活动，工作团同志出去，都带着步枪。我和小徐出去，向工作团里借枪，借到的常是一支开不响的枪，小徐心里很不高兴。但我觉得有这支哑枪比没有总好一点，至少在紧急关头，还可当棍子使用。这时候我才想起了廖志高同志叮嘱我的话，浙江的情况确实复杂，应当警惕。我的主观思想及和平观念未免太严重，根本没有仔细想过这是国民党反动派的老家，他们已足足统治了二十多年。在离开东北时，我把手枪都送了人。对这地方的老百姓，我们一点也不了解，我们专拣一些茅草小屋，显然是穷苦的人家，进去访问。他们男女老幼都是冷冷淡淡的，什么也不肯说。他们还有变天思想在作怪。自然这也不奇怪，他们长期在国民党反动派统治下，对共产党既不了解也不信任。我想起延安和晋绥、晋察冀……等根据地的农民是多么的不同呵！

这时候，团长在杭州有事，我没有见到过。副团长在领导全团的工作，他是工人出身，过去是地下党员。在团里，还有一些是在杭州解放后参加工作的男女知识青年，经过在浙江干校的短期学习后，分配到工作团里来的。我对这地方的老百姓不了解，对工作团里的同志们同事们也不了解。我不了解他们，他们也不了解我。我到了一个完全陌生的地方，没有一个熟人，竟有一种“独在异乡为异客”的感触，唯一的同伴知己就是小徐。慢慢地从这里那里，从这个人那个人口中听到和了解到一些情况，在我们到来的不久前，工作团里的一个男同志，独个人出去，没有带枪，竟不见回来。过了两、三天发现这同志的尸身被捆绑在村口的一个凉亭柱

子上。土匪猖獗到这个地步！这个案子还没有破。

有一夜，大家听到一种奇怪的声音，好像是马跑在马路上，又象是汽枪声，大家捉摸不定，疑心是土匪活动，可是这声音一忽儿高一忽儿低，究竟是什么？为了小心起见，我提议在窗口架了枪，由大家轮流守着。到天微明时，副团长同几个同志向着那发出声音的方向走去，看到原来是一辆破风车在转动，转动到坏的地方就慢下来，声音就低些；当转过了坏处，转动快了，声音立刻高起来。在这一场虚惊中，我又感到了自己的主观，害得大家轮流守枪。过了些日子，副县长来到村里，在这个乡发动群众诉苦，斗争恶霸地主兼伪保长，诉苦会接连开了五个晚上，一次比一次深入，贫雇农终于从不敢说到敢说敢斗，开始挺起胸直起腰来了，不再象开始时和他们谈过去的艰难日子，总说最可怕的是抓壮丁；如果问：“怎样抓壮丁呢？”他们便只回答：“问那个伪保长么！”现在呢，什么顾虑也没有了，他们把伪保长、恶霸地主的罪恶统统说出来，要求共产党、人民政府替他们作主，帮他们申冤！

剿匪反霸的斗争正在深入发展，徐文玉同志生病，起不来了。好几天来，他常常不让我知道，脱掉上衣，只穿短裤，浸在运河里，我知道后，劝他不要去，他说身上热的受不了。这时候，我自己也发冷发热，有时冷得发抖，热得头晕。这样，我们决定请假，到杭州去找医生诊治一下，在村子里找不到医师。一到杭州，我就送小徐去医院诊治，他已经病得鼻孔出血，牙缝出血，连眼睛也出血了。医师诊断结

果，说小徐患了恶性疟疾，他从来没有生过这种病，来势特别凶。他住进了医院。我经医师诊断，也患了疟疾，医师给我配了些药，回来，由省委组织部介绍，住进了当时省委的招待所新新旅馆。过了两天，我的病变得很有规律了：隔天发冷发热，象我还能记得起来的童年患的寒热病——疟疾。省委机关的医务所离新新旅馆很近，医师来给我诊治，并给我一些奎宁。我的疟疾拖了好些日子。小徐在医院里住了一个多月，他回到我跟前的时候，我也已好了。我们到组织部去，我还是要求下乡，对于小徐，看他又瘦又黄，不能再让他去农村了，我请求组织部是否让他进党校学习一段时间，再分配他工作；目前，他不能适应南方的气候和环境。组织部同志说现在需要人去工作，先分配他到杭州铁路分局工作，以后有机会再让他学习。至于我的下乡问题，要请示谭政委。谭震林同志出来，他诚挚地对我说：“下乡将来总有机会的，目前还是在城里做点知识分子工作，以后习惯了南方的生活、气候，再下乡吧！”他劝我到某某大学去工作。我害怕到知识分子中去工作，自己没有一点经验，况且来杭州之前早已想定了下农村去体验生活的。我微笑着说：“再下乡去我就习惯了。”这是我第一次不服从组织的分配，而是坚持自己的想法。谭书记说：“再考虑考虑！”回到新新旅馆，一天又一天，总不见通知分配工作，心里就焦急起来，不做工作，我一天也难熬。于是又跑组织部，组织部的同志回答我说：“谭政委要你去某某大学。”在这期间，省里成立了中苏友好协会，我模糊地记得会长是省委第一副书记谭启龙同志，我在他们

下边担任了一个职务。我曾搬到这个会址去住过一些日子，没有多少具体工作，大约写过一点散文，在那时的《浙江日报》上发表。我还在争取下乡，谭政委还是劝我去某某大学，这我心里是完全明白的，他是出于真诚的爱护和好心才叫我去某某大学的。到十月底，在某某大学快开学的时候，我同意去，就搬进学校去住了。由于修理校舍，开学很晚，已近十一月了。至于小徐，早已去铁路分局。到大学不能带通讯员，请了一个保姆，帮我买菜煮饭。

我的住处是由大学原来的地下党员同志们安排的。我被安排在校内的一个小院子里，大门进去，有一个小天井，一排两户房间，靠边有两间灶间。里边的一户住着一位地理系的教授，据说是气象学专家。他们的房间大，比我这户多一间。我住的前后房两间，里边的一间我用来住，靠壁放一张小木板铺。临一对长窗放一张小桌子和一张小木椅，长窗外是一个极小的天井，我工作，睡觉都在这间屋子里。好在我没有什么东西，也不觉狭小，而且还很清静。我看大嫂依靠她抚养大的侄儿过日子，生活艰难，把她接来住在外间。外间搭有一张木板铺，大嫂睡的，一张方桌，两张小方凳，这些简单家具都是向学校里租的。另外，从大嫂处借来一只小米缸。小保姆是一个校工的女儿，早上来，晚上回家去住，就在附近。

谭政委叮嘱我，要我把工作的重点放在全校的政治课，也就是知识分子的思想改造上。我的正式职务是担任文学院中文系的三、四年级文艺理论和写作课教授。由于我的要

求，组织上批准，留下了一个刚从中文系毕业的党员，担任我的助教。学校有五个院：理、工、农、医、文——法学院已经停办。师生员工共约五千多人。学校的情况非常复杂。解放前，这个学校的进步力量是强大的，然而反动力量也不小。杭州一解放，由于工作上的需要，党调走了原来那些有斗争经验的地下党员，留下的近十来个同志是解放前夕参加党的，分散在五个院里，其中一个讲师，一个是助教，一个女同志刚从历史系毕业，安排在人事科里，其余都是学生。在我进校不久，省委决定公开这大学的党组织。决定我担任党支部书记，支部副书记由工学院机械系学生徐子才担任。组织委员由理学院物理系的助教担任，宣传委员由工学院的土木系讲师担任。全校组织了一个政治课委员会，参加这个委员会的是一些在解放前表现进步、拥护中国共产党的几位教师，其中有一位是兼做行政工作的教务长严仁赓先生，起初我一点不了解，慢慢才知道他从美国回来不久，浙江解放，他被委派接管这个大学。他是研究经济学的，也是一位专家，在接触中，感到他为人正直、诚挚，也没有什么架子。校长是经济学家马寅初先生，曾被国民党反动派软禁拘留关押了好多年，他是真诚拥护中国共产党的。他家在杭州，但不常到学校来。他和我一样，在这个学校里没有一点点基础。

我花了很多的力气来开中文系三、四年级的这两门课，但是更多的精力是花在全校的政治课上，必须常常召开政治课委员会，后来称为学习委员会，大家交换意见，提出建议，反映些情况，讨论学习什么。

对于帮助我做中文系助教的这位同志，我对他一点也不了解，这人的政治品质，个人历史，社会关系，统统不知道，也不便探听。我原来也不曾期望他给我什么帮助，只想能不能从他那里了解一点学校的情况。他有时对我显出一种轻蔑的神态，当然我不会计较，视而不见。同时，觉得也难怪他。

有一次，马寅初先生到学校来，正逢上全校召开学习的大会，请马寅初校长讲几句话。他刚上台，还没有开始讲，台下的师生就鼓起掌来，一直鼓个不停。实在是拍倒掌，不要听他讲话。于是我走到台边，说：“大家已表示了对马校长的欢迎，现在请马校长讲话！”掌声才停了。我渐渐地感觉到某大学有一种类似这一帮那一帮的特色。理学院有理学院的，工学院有工学院的，农学院有农学院的，医学院有医学院的，文学院有文学院的，各有特色。这并不奇怪，应该说是好的，因为各行各业都应当有专门的特长和特色。但我认为不应当把自己看的太高，只有自己是天下第一，其他都是不行的。只知自己这行有专家，不知别行也有专家，未免有点孤陋寡闻吧！

那一天，我和全校学习委员会的同事们在财务科里面的一间小房间里开会，这小房间没有门，中间有一个门框。我们在讨论是否全校学习毛主席《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》，当休息的几分钟里，有的同事在门框边踱步，正好理学院数学系主任在财务科干些什么，看到了我们。他问我们在讨论些什么，教务长告诉他，在讨论准备学习毛主席《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》。这位系主任在学校里是有名望的、留学

日本的数学博士，当时系里还有一位留学日本的数学专家，极有声望。这位系主任却特别以骄傲闻名。他对站在教务长旁边的我说：“这有什么意思，用不着学！”我一听这话，克制不住内心的气愤，感到不批驳他，真对不住党和毛主席，严肃地说：“你这话不对，毛主席这篇著作，并不只有文艺工作者需要学习，任何人都需要学习，因为这里面讲到改造世界观的问题，难道只有文艺工作者需要改造世界观，别的人就不需要改造世界观了？”

“我们是理科，不管这些，我们不学！”这位系主任板起脸孔说。

“理科工作人员也要改造世界观！”我毫不客气地说。

这时，教务长插进来对我说：“我们要继续讨论了。”他其实是来打岔，好把我们劝开。我回到会议桌子旁边，这位系主任悻悻地走了。

当开完会，我回到自己住处，想起了刚才对这位系主任的批评。在当时，我克制不住，觉得如果对他的错误意见不进行批驳，就没有尽到自己的责任。我从来不喜欢在背后议论人，认为有不同意见应该当面直说。我没有说得委婉一点，这是缺点，在当时，实在没有时间容许我这个耿直的人来委婉了，想起来是遗憾的。我已知道，在这个学校里，理、工学院特别出名，教授特别有名望，有好几个留学生、博士、专家。这位系主任是留学生、博士、专家，是有真才实学的。但对我这个人来说，什么留学生，什么博士，什么专家，我倒真的见过一些，实在不觉得太稀奇。只是想到从党

的政策和群众观点出发，要团结和帮助知识分子，我只应对这样的人客气和有礼貌。这一次，我实在是被迫进行批驳的，决不是自以为是，教训别人。但万万想不到就因为这一次的批驳，竟埋下了祸根。

在我看来，知识并不是用来为私人升官发财、作威作福的资本，而应该是为社会主义祖国、为劳动人民服务的一种工具罢了。可是并非所有知识分子都是这么想的。

过了几天，党支部里有一位同志悄悄告诉我，说支部副书记徐子才和几个同志联名写信给省委宣传部，控告我不尊敬老教授，已决定在报上写文章发表，公开批评我。我天天等着读批评文章，但直到我离开这个学校，批评文章并没有出来。我也曾想为什么副支书不当面批评我，不在支委会上批评我。省委宣传部收到信也没有找我谈话，问个清楚。我也曾想过，省委宣传部会不会对我有了想法；但又想我是党员，党总要教育我的。我又想事实是歪曲不了的，总有一天是会弄清楚的。历史是无情的，总有一天会告诉那些不明真相的人，陈学昭是怎样一个人。自己不会暗地里算计别人，不会耍两面派，不会阿谀逢迎、吹牛拍马。可是自己有信心，在任何情况下，要做一个正直的共产党人。

事情多，花样多，刚处理好这件事，又来了那件事。整天头昏脑胀，忙于应付。到后来，只好夜夜开夜车，半夜十二时睡下，早上三时起来备课。到了早晨八时以后，就有各种各样的人来找我了。

在上现代小说课的时候，一些学生发出一连串的责难，

他们认为写工农兵的小说，题材单调，描写简单，艺术价值不高。还有不少的学生在听我讲毛主席的文艺方针时，既不说好，也不说坏，“环顾左右而言他”，不置可否，而内心是抵触的。使我感到特别惊奇的，每当讨论一篇文章或一部作品时，他们习惯地沉溺在推敲一字一句，对于整个内容，作者通过人物所表达的思想、感情、观点等等却毫不感兴趣，是不是他们从来没有学习过分析一篇作品？

接着，一天，学校靠近我住的地方的一个厕所里发现了一支手枪……我住的小院子门上发现了反动标语，该是在夜里贴的。这些事直到一九五〇年放暑假时我离开学校，还没破案。

和我同住一个小院子的紧邻，曾经在反动派的特务机构中央统计局工作过，但他没有跟反动派到台湾去。据说这是因为他觉得这个特务机构不够重用他。常常，当他喝饱老酒，仗着几分酒意，他就来敲我外间的门。有时，我正在吃饭，这位教授踉踉跄跄地站在门外，用力敲门，大声地骂党的领导者。我开门出去，严厉地看着他，他才后退了两步，叽咕着回家去了。

在党支部里，同志们的问题不少。副支书徐子才家据说是个破落地主，他自己没和我谈过详细情况，我也不便去问。只是支委向我提出他不单单缴不出伙食费，而且在家乡的他的哥哥、嫂嫂也必需寄钱去养活，究竟是怎么一回事，无法问究竟。付不出伙食费的不止他一个，还有两、三个。这些负担都自然地落到了我的肩上。自从进这学校工作起，我不

再是供给制，而改为拿工资，每月的工资不少，可是有一天我的米缸空了，身边只剩下了几个零钱。大嫂很生气，虽然没有批评我，她板着脸孔对我说她要回侄儿那里去了。后来她问我：“午饭吃什么？”年青的保姆很关怀我，她不声不响拿出钱来给我去买了十斤米，还买了点菜来煮，打发了一餐午饭。

在这段时间里，由徐子才和组织委员决定，形式上经过讨论，发展了一个党员，那是农学院的一个学生，他们认为表现很好，我得承认我是一点也不了解的，当然我只该听支部多数人的意见，表示了同意。还有中文系的一个女生，她主动地找我，对我谈一些系里的情况。这个女生的父亲是农学院的教授，在我一进学校后不久，就写了一封信给我，要我帮助教育他的女儿，还写了一些恭维话。在我最初的印象，不单感到有点奇怪，也很不懂；因为直到后来，都没有人写过这样的信给我。教育系有位留美的闻名教育家郑晓沧先生曾来看望我，他是我的老乡，而事实上是我的表兄，可我为了解嫌疑，一直没有认他，叫他“郑先生”，象对一般教授的称呼。

支部里，对于这位中文系女生、农学院教授的女儿，认为可作培养的对象，特别是我的助教，一再提出要培养。

一九五〇年过新年的时候，支委里的同志们，要我去向各系主任、各专家家里去拜年。我在延安久了，在延安过年都是集体活动，已经不习惯于旧社会的那一套习俗，但还是听从了他们，我想这也对，这是为了团结这些专家们，应当对